

●序

壬戌之冬，余撰《家言》，而有《春明梦录》之刻。次岁，复将《郡斋影事》、《西江赘语》刊成。其时甫赋遂初，略摭旧闻，本有语焉弗详之憾，拟作《客座偶谈》，补其罅漏。乃迟迟十年，屡屡易稿；兼以世变日新，闻见益夥，遂复哀然成帙。而事关国故，居多不忍弃置，因就旧稿。重加编辑，录而存之。盖自辛丑举办新政之后，又三十年矣。三十年为一世，世事变幻，长安一局，古往今来，不过如是，转若无足深悲者。盖旷观大势，不能无所悟也。甲戌冬至，平斋何刚德。

●卷一

官制随时变更。清初不置相，后乃设军机大臣，行相之事。不定额缺，所谓官不必备，惟其人也。两宫垂帘听政，则军机必以亲王领班，下以数大臣辅之，所谓军机王大臣是也。凡事由亲王作主，商之大臣而定。每日上班，必由领班之亲王开口请旨。所请何旨，即未上班时所商定者，虽偶有更动亦罕矣。是合外国君主、内阁之制而参用之也。惟辟作福，惟辟作威，殆不尽然欤。

清制，京官满汉分设员缺，而满缺每多于汉缺。然员缺虽满汉并设，而办事多以汉员主之。事务之繁，惟六部为甚。六部之中，尤以户、刑二部为甚。户、刑二部分十八司，其余四部皆四司。除堂官外，司员办事者，实缺之员或不敷用，以候补之人充之，其余事简而职之闲散者，不过备员而已。二百余年，未闻事有不举者。外省督抚司道府县，各有专官，每省定额不及百缺。其附属之丞、杂职，大省不过二三倍，小省亦求其称而已。

前清宫俸之薄，亘古未有。或曰：洪承畴有意为之，以激怒汉人。而不尽然也。一因满人占额太多，不敷支配；一因人心厌乱，容易服从也。今试以京官言之：正一品大学士，春秋二季，每季俸一百八十两，一年三百六十两；是每月只三十两。递减而至于七品翰林院，每季只四十五两，每月不及八两也。至于六部，全部公费及官吏廉俸薪工，姑以吏部言之，每季二万三千余两，以数百人分之。其余小九卿十数衙门，十不及一二焉。外官另有养廉，比京官为优，今举其略言之：边省督抚独优，年支二万。东三省新制，加至三万。其余大小省，均在二万以下、一万以上。藩、臬一万，以下递降。府则三千，县则一千二百，亦以次递减。外官俸与京官同，且皆坐罚不领。其余丞、杂职，统计不过数千而已。此为取于国库言也。此外，藩司粮道及知府，有公费，取于州县平余，其余特别差务，亦皆由此项供给钱粮，少则数千，多则竟将十万。粮有多少，即平余有盈绌，盈者年所入可数万计。此外别无所谓政费名目。至若督抚，则有关税、盐务之津贴，然非有明文，受与不受，亦视夫其人耳。惟

收粮、收税之机关，由道迄县，不得谓之非弊。凡公款应甲月解者，迟至两三月始解。则此两三月，可以发商生息。公款以关道为多，此项息金亦颇可观。然商欠危险，则责其自理，与库款无出入也。若一归库，则成为库款。藩库道库，皆由首府随时查点，现银向不能轻动。实缺外官支领库款之实数，一省之中，无论如何，大省年不过二十万，中小省可知已。此外，则候补供差各员薪水，皆由各局支管，而以藩司总其成，大概道员知府百数十金，州县以次递减。每班只寥寥数人，归诸二十万之内，亦绰绰有余。是此项支出，二十二行省，四百四十万括之矣。京官自光宣年间，风气渐滥，员缺推广，部用渐繁，然尚不失之远。而外省则依然支绌也。

官俸既薄，而庶人之在官者，薪工亦随之而薄。禄不足以代耕无论矣，而纸张之给价，几于有名无实。论者所以有以弊养人之说。而不知弊之徇于私者，谓之弊；逼于势者，不得谓之弊。明人笔记，于吏部制签，尚有微词，似吏之有弊，莫吏部若也。余官吏部十九年，明知部吏领照有费，引见有费，补缺有费，皆有其不得已之故。然吏之对官不得言费，一言费即以作弊论罪。且费自费，公事自公事，毫不相涉也。至于钱粮之弊，人言全在书差。凡串票零数，固不免沾润，然口口声声，必抱定钱粮丝毫不重一语，谓之尚有忌惮则可，谓其洁己奉公则未然也。总之，官明则弊少，官昧则弊滋，一言蔽之矣，亦不得归咎于立法之不善也。

前清官俸薄，而吏之禄徒有其名。今日者，吏裁而官独存，官存而俸独重，是以常苦不足也。然今日患官多，而专任之官却少。每一事，必使数人分任之；而分任之人，又各有其分任。如科员、股员、办事员，似官非官，其实化吏为官。皆食官禄者也，即《周礼》所谓府史胥徒之类也。《周礼》府史胥徒未曾实行，而今则已实行矣。议减政费者，竟言裁官，不知今之习为官者，皆名为士者也。官多则养士多。然则士可不养乎？报载法国减政，裁官八万人。法国正患失业人多，今又增此八万人，岂不更多乎？此事近成为环球通病，各国方共谋救济，所当择善而从也。

有清入关之初，文字之狱滋炽。康乾以降，崇尚儒术，满汉之见渐融。道光中叶，满人柄政，又复排斥汉才。迨洪、杨变亟，起用林文忠，中道星陨，行省糜烂殆半，亡扰逾十稔。曾、胡、左、李诸公，以儒将风流，削平大难。朝廷惩前毖后，知汉人之有造中国，复壹意向用之。同光之际，外省大吏，满人所占特二三耳。宝文靖师相尝告余曰：“满洲一部人材，安能与汉人之十八省比？”盖满人之达者，固不以排汉为然也。光绪末造，举错渐歧，旋而亲贵用事，不特排汉，竟且排满焉，大事遂不可问矣。

林文忠于虎门之役，焚毁鸦片，朝廷以其办理不善，遣戍伊犁。论者谓权

相媒孽，同僚猜忌，致铸此错。事后群引以为恨。其实不止此也。当日英人挟死力以求贸易，不遂其欲不已。文忠仅以一人，独任其艰。而一般之徒，布满中外，进退鲜据，奔走喘汗，酿成五口通商之局。此盖天祸中国，故使之毒痍四海，延及百年。中国兴败之机，关系甚巨，非得以一时一事论也。今者文忠声名洋溢乎中国矣，而流毒未已，九原有知，当必有无限隐痛者。是岂庸俗人所及见哉！

文忠仕于道光一朝。其时满人枋政，公适丁其厄，备历艰屯，而矢志以忠纯，卒能以功名相终始。盖其自监司陟疆圻，所至有恩，每莅一事，不动声色，必挟全副精神以赴之。而生平所致力者，尤在农田水利。久办河工，洞悉利弊，尤以筹办畿辅水利，为根本之根本。即遣戍塞外，奉命屯垦，犹大兴农利于新疆。人第以禁烟之名震之，而不知纯臣之经济固别有在也。今者烟毒流行，英人尚且知悔，而国人之犯瘾者，效尤不已。事之可痛哭流涕者，夫复何言！惟当此全球患贫之日，中国根本之计，还在于农。诚举东西迤北闲旷之地，秉畿辅水利之议而推行之，参以大农新法，其规划必有可取，庶亦救国之一道也。

前清八旗，满兵隶京营饷较厚，各省之驻防旗兵次之，汉兵则较薄，且于厢正旗色白黄红蓝之外，别之曰绿营。或曰洪承畴定制，亦具有深意也，升平日久而暮气生焉。洪、杨起事，绿旗各营一败涂地，即仅存者，几不能成军，竟有互相残杀者。自湘军、淮军以乡勇继起，肃清海宇，而军制为之一变。二十年逐渐裁撤，而气势尚雄。余官赣、苏两省，赣则防营凑合约有七千，苏则练添新兵两标，海疆无事，亦尽足以资镇压也。北洋练兵日有声色，然尚未脱湘淮窠臼。今军阀失败，诸将虽变更面目，其意见岂尽销融哉？

曾文正率湘中子弟，起而平难，金陵克复，而捻匪尚炽。文正以湘军渐有暮气，器械亦不如淮军之精，且湘中子弟皆有田可耕，不若退而归田，而以剿捻责之淮军，盖让也，非诿也。李文忠起而继之，盖任也，非争也。厥后，卒以淮军平捻。其时湘军虽未尽消灭，其气势总不如淮军之盛。余到奉天时，过山海关，驻防三千，铠甲鲜明，身材骠壮，恍有临淮壁垒气象。文忠练兵北洋，淮将尚多才，然亦间收他省人，不过示畛域。袁项城重练新军，仍以北洋为名；而北洋虽为北人口头所公用，其根底则仍不脱淮军。后直隶诸将踵起，遂据北洋为已有，于淮将渐起争端，省界益明，而内讧之祸烈矣。

闻咸同之际，军务紧急，朝廷日盼军报。遇有胜仗，即用红旗报捷，飞摺八百里驿递。所谓八百里者，真八百里也。驿站遇军务时，每站必秣马以待，一闻铃声，即背鞍上马接递。其忙急至于如此。然奏报中所叙战情，委曲详尽，一若好整以暇者。按之事势，种种可疑。后查知其幕府言，此等奏稿，皆



于未战之前，先行拟定；一得胜仗，即行发摺，驰陈其当日如何冲锋，如何陷阵，贼从何地来，我从何地追，杀贼若干，获战利品若干，皆由幕府以意为之。将来如有事实太悖谬处，只于奏报详细情形时，设法补救，亦不必显为更正也。然后来所撰，平定某地某匪方略，皆根据当日奏摺原文，酌量删削，不能自赞一辞。今之战事如此，古之战事何莫不然。读史者不可不知。

同治改元，两宫垂帘听政，以恭忠亲王为议政王，在军机处行走；大学士桂文端（良）、户部尚书沈文忠（兆霖）、侍郎宝文靖（）、文文忠（祥）并为军机大臣；鸿胪寺少卿曹恭恣（毓英）学习行走。元二年，群盗如毛，旋仆旋起；诸将争功，互相，且有官军互斗之事。曾文正能是将，不能将兵，临阵屡败，而犹能上乘朝谟，制驭诸将。得以决胜疆场者，非得军机诸臣运筹帷幄，知人善任，极力维持，何以得此？三年六月，南京克复。论功行赏，曾文正（国藩）晋封一等侯；曾忠襄（国荃）一等伯，加宫少保衔；提督李（臣典）一等子爵，赏黄马褂；萧（孚泗）一等男；均赏双眼花翎。按察使刘（建捷）赏世职。又以各路剿贼功，封僧王格林沁子伯彦讷谟诰为贝勒；官文忠（文）、李文忠（鸿章）一等伯；骆文忠（秉章）一等轻车都尉；都兴阿、富明阿、冯子材骑都尉；魁玉云骑尉。中兴功臣，戮力疆场，除死亡贬谪外，无不叨恩，所谓有幸有不幸也。八月，复以江南平论功，晋封恭邸子载贝勒、载入八分辅国公，载滢不入八分镇国公；加文文忠宫太保衔；宝文靖、李文清（棠阶）宫少保衔；曹侍郎（毓瑛）赏加头品顶戴花翎；其余宗亲、御前大臣、内务大臣，各赏赉有差。

军机加恩，所以后于诸将帅者，意谓军机特承旨书谕耳，无功可言，政权固操自上也。不知两宫初政，春秋甚富，骤遇盘错，何能过问？所承之旨，即军机之旨，所书之谕，即军机之谕，此亦事实之不可掩者也。恭邸虽总揽大纲，然宝文靖尝对余言：“恭王虽甚漂亮，然究系皇子，生于深宫之中，外事终多隔膜；遇有疑难之事，还是我们几个人帮忙。”当战事吃紧之际，可见王大臣同寅协恭，艰难宏济，为煞有关系也。恭邸、文靖在直二十余年，可谓得君专而行政久矣。光绪十年，军机全体被劾，恭邸家居养疾，文靖原品休致，盖皆念其前劳，未加降黜也。

文靖，吾师也。退居八载，吾常侍杖履。薨逝之日，饰终之典甚厚。及其葬也，吾送之，见平地一块，掘土二三丈，长如之，宽稍逊。旁露一旧棺角，盖其夫人葬在先也。下棺后，即将地上原土覆之，上筑一土坡，绝不加一灰石，盖恐一加灰石，即与地气隔绝。余则封树，自稍有规模。北人厚葬，不过如此。卧龙跃马终黄土，此黄土实际也。人生若梦，此固一热闹之梦；若未成功而歿，或竟遭杀戮，尚不知若干梦也。

沈文肃尝言：“中外在今日，皆有得过一日是一日之势，中国不必遽自馁也。”盖以当时列强，广置兵舰枪炮，用财如泥沙，而暴敛横征，民力不堪，实有岌岌之势，文肃之言非无见也。然文肃此言，亦在于光绪初年创办船政后，阅历渐深。渐有觉悟也。观其作船署对联曰：“以一篑为始基，自古天下无难事；致九译之新法，于今中国有圣人。”当时亦震列强之强，而毅然为之，后见列强以科学致富，济强政策万不足持久，故发此叹。今乃知其有远见也。

沈文肃任船政大臣时，藩司因买铜不报，谓与税款有碍，用札驳诘。乃立缚藩吏，以“阻挠国是，侮慢大臣”八字杀之。当时因绅士在乡办事，恐滋掣肘，闽省风气，绅弱官强，故不能不杀之，以示威耳。不数时，船厂有一小工窃洋匠汗衫。乃执而告之曰：“汝偷外国人汗衫，太不替中国人做脸。”遂喝令处斩。公余，亦集僚属作诗钟。有一日，未终唱，忽告人曰：“我适有事，少顷回来再唱。”遣人间之。则坐大堂又杀一人矣。当日船政，弊绝风清，洋匠卜伏，亦赖有此耳。

左文襄由浙赴闽，驻节上游，寄书到湘，说闽奇瘠。前阅其所刻家书，大有懊丧之意。且其时各省凋敝。饷源只靠厘金，乃以三千金拨款，动与人齟齬，其困苦情形可想。迨到省城，增建正谊书院，创桑棉局，大有百废具举之概。虽当时建设费省，究非有款不办。余少时，在老屋门口，见其湘勇三人，与肩挑赌骰，失败，怒掷两钱，拿粳米果五粒而去。此是其部下蛮横处。此外并未闻有苛索滥征之举。足见其经画之精，规模之远也。

光绪甲申，法越肇衅，讲官张佩纶、宝廷诸人，相约弹劾权贵，操纵朝政，时人目之为清流。且有不闻言官言，但见讲官讲之语。虽阴主者固有其人，然全体军机同日罢职，懿亲如恭邸亦令退居，朝端气象为之一新，不得谓非钦后之从谏如流也。厥后，法舰闯入马江，海军以不战被，张坐失机落职。滇越陆军失利，老亦以举荐主将非人降调。功罪赏罚，各加其分，在清流无所为荣辱也。惟张于罢官后，为李文忠赘婿，致招物议；宝亦以福建试差归途，娶浙江江山船妓，上疏自劾落职。清流之贻人口实，亦不能一味尤人也。

近年大乱，非人有意为之也，误在“随声附合”四字。一事之起，一人倡之，百人和之；倡之者非尽出于无意，而和之者可断其为盲从，阴错阳差，必闹到不可收拾而后已。甲申法越、甲午中日之役，主战者不过一二人。后和之者日众，竟有明知其不可战，而不敢言和者；甚有料其战之败，先搬眷出京，而上摺请战者。及至割地赔款，则鸦鹊无声，瞠目相视而已。此余所亲见之事。拳匪之役，在余出京之后，其倡和情形，亦复如是。此又余所熟闻之事。两事已成隔世，追思之，尚有余痛也。

清流之起，人多疑其挟私意。然其激于义愤，志在救国者，往往而是。特流弊所极，有当时所不能意料，及至事变发生，则必瞠目相视，而有早知如此悔不当初之叹。夫论事必须洞烛始终，处事必宜熟权利害；旁观论事，与当局处事，要宜易地而观。世之訾人者，每曰成败论英雄，吾独以此论为未允。语云：“毫厘之差，千里之缪。”为英雄者，苟能毫厘不差，即为千里不谬，必可有成而无败。此按诸已事，无一爽者，可不惧哉！

中华开化数千年，中间奇奇怪怪之事无所不备，一一皆有踪迹可寻。承平日久，法度修明，或因事涉猥褻，正史不采；或因说近支离，正人弗道，日久半就消灭。迨纪纲一坠，乱象纷，世人所惊为创见者，实亦不过故态复萌耳。但如梦如泡，依稀恍惚，达者观其通可也。

北洋练兵之议兴，以三十六镇为标准。论者即惴惴焉忧之，以为中国国力，万不能堪此重饷也，今日之兵，何止五倍三十六镇之数，兵额几冠全球。然则饷何自出乎？官筹之不足，只有任其自筹，而苛税杂捐诸弊遂不可制止矣。今之人但苦兵多，而亦知兵之所以多乎？科学与人工互消长，凡兴一事业，便于多数之民，不暇计及少数。且新事业，亦未尝无用人也；不知所用之人，远不敌所不用之数也。是今日之兵，皆此等失业之民渐积而成也。其不容于兵，必趋而为匪。兵匪交哄，民无立足地矣。海国机器流弊，工商恐慌，其乱未必不与中国相等。国际亟亟开会，名曰救济，实则各自为谋，而其意在筹饷，则一也。

庚子以前，中国无警察也。余到苏后始创办。端午桥制军告余曰：“以中国地大，只求一里有两个警察，年已需五万万。以全国岁入，办一警察，尚复不敷（当时岁入未至四万万），何论其他？”渠倡言立宪，喜办新政，所言竟与之相反，不知何意。嗣后各县勉强兴办，小县二三十人，大县亦不过五六十人。民国成立，却逐渐扩充。今者江西剿匪，以警察不足恃，又复劝行保甲。可知国土太广，国力太微，遽废旧法不可也。

《易》曰：“弧矢之利，以威天下。”后代则间用火攻。前清入关，犹以骑射取胜，可见当时火器尚未甚烈也。咸同时，曾文正初见开花炮，则曰：“此器不仁甚矣。然海疆多事，不可不备。”语载《求阙斋弟子记》。文正第言备而已，可见当时湘军并未惯用也。光绪年间，薛叔耘驻使，作《庸庵笔记》。云：“外国科学发明，战器日精，将来必有云间作战之一日。”当时尚未有飞艇投炸弹也。事未百年，战器名目，日新月异，不可胜数，而军费奇巨，虽富强之国亦感拮据。欧战之后，列强觉悟，迭订和平之约。然一面订约，一面购械，以固国防，其费仍不貲，无论何国，杼轴空矣。故列强变计，而趋于军缩之一途，岂能视为儿戏哉！



## ●卷二

古者学古入官，谓官必须学古，而后可入也。然官有限，而学古之人无限，学古者必欲人人入官，则天下乱矣。故孔子于子张学干禄，则以寡尤寡悔抑之；于漆雕开之斯未能信，则说之。盖深知人人做官，处于必穷之势，故以谋道不谋食之旨，劝弟子以安命也。孟子曰：“得之不得曰有命。”圣贤教人，无非使人专精于为学，不可急于求官，千言万语，意在弥乱而已。科举时代，广设科目以容之，苛持绳尺以厄之，使天下聪明才智之士，消磨精神于不知不觉之中，而拔其一二，为治世之用。势之所迫，盖不如是，不足以弥乱也。

有清时代，一科举时代也。二百余年，粉饰升平，祸乱不作者，不得谓非科举之效，所谓英雄入吾彀中是也。大抵利禄之途，人人争趋。御世之术，饵之而已。乃疏导无方，壅塞之弊，无以宣泄，其尾闾横决，至不可收拾。末季事变纷歧，何一不因科举直接间接而起？而究其始，特一着之错，不知不觉耳。

科举时，有举人，有进士。从前举人不中进士，即可截取，以知县按省分科分名次，归部轮选。当时举人何等活动。乾隆年间，以此项选缺尚欠疏通，乃加大挑一途。凡举人三科不中，准其赴挑。每挑以十二年为一次。例于会试之前，派王公大臣在内阁验看，由吏部分班带见。每班二十人之内，先剔去八人不用，俗谓之“跳八仙。”其余十二人，再挑三人，作为一等，带领引见，以知县分省候补。余九人作为二等归部，以教谕训导即选。行之数科，逐渐拥挤，外省知县，非一二十年，不能补缺，教职亦然。光绪以来，其拥挤更不可问。即如进士分发知县，名曰即用，亦非一二十年，不能补缺，故时人有以“即用”改为“积用”之谑。因县缺只有一千九百，而历科所积之人才十倍于此，其势固不能不穷也。

举人于大挑之外，且更有教习、誊录、议叙各途。种种疏通，无非使举人皆得由知县、教职两途入官也。秀才则予以五贡升途：恩、副、岁三贡可选教职，拔贡、优贡许以朝考；亦以知县教职入官，拔贡且有小京官之希望。亦未尝不为秀才谋出路也。无如源泉混混而宣泄不及，当日百计疏导，于事终无济也。

当时进士分省之即用知县，拥挤固如前所述矣。主事一途，光绪年间，非二十年不能补缺。捐班者补缺无期，与此并无影响。余十四年而得补缺者，因在吏部，较疏通也。中书一途，欲升侍读，与主事之难同。至于补缺后，截取同知，分省候补者，则与即用知县等耳。惟翰林一途，当时最为活动，每科学政十八人，正副主考三十六人，乡会试房考各十八人，每科有九十人之差。而当时翰林不过数十人，以之分派，每科一人竟有得两差者，宜其优胜也。乃至

光绪年间，长短大小之差，仍是此数，而馆选太滥，人才拥挤，考差者竟有二百余人之多。平均牵算，每人约须九年可得一差，且得一差而若系房差，则九年之中，只得数百金而已。试问如此养士，如何能济？两次推翻军机之事，亦实相迫而成，不得谓非当轴者之过也。

进士殿试次晨，钦派科甲出身之大臣八人，入内阅读卷。譬如进士三百二十人，每人应分四十卷，由八大臣各定次序。八大臣中，以宪纲为次序，先抽十卷，前一日进呈。其第一本即为宪纲第一者所定，第二本即为宪纲第二者所定，挨次推到第八本为止。其九本十本，则仍为宪纲第一第二者所定。是状元定为宪纲第一者所取，榜眼为第二者所取，探花为第三者所取，传胪为第四者所取，其余则同归二三甲。若进呈十本卷，有经御笔改定者，则又视各人之造化，然总不出此十本中也。此种办法并非例定明文，当时必因读卷屡起争端，故定此标准，虽曰调停，亦逼于势耳。其实著意只在十本卷，其余则每八本挨次堆叠，二甲之为进士，三甲之为同进士，亦归之于命而已。余字之劣，得附二甲，即其证也。且好字不止十本，若尽不入宪纲，在前四人之手，则鼎甲传胪，岂不是尽无好字者？此亦极不平之事也。

考试试差，定例阅卷十人，取卷只以八十为限，每人取八卷，则落第之卷亦自不少。取定之后，由军机揭弥封，开单进呈，单便留中。放差不在此单，断不能放，故军机北屋留一底单，南屋之小军机不能知，礼部不能知，即阅卷者亦不能知也。不过阅卷者记得诗句，或在外私言耳。放差之日，礼部具题，仍照全单列名请旨：军机则检出底单，每差酌定正陪二人，请御笔在礼部题本上圈定一人，即行宣布。考差者不知取不取，只论放不放，故恩怨不归阅卷之人，而专归之军机。军机于单内择二人作正陪，虽于差之肥瘠、路之远近，或不无照顾私人；至于欲以取低之人放大差，取高之人放小差，则单内明白易见，岂能当面作弊？大概放大省学差及正主考，除大考差之三品以上大员，由钦定外，其由小考差而得学政，非取在前十名不可。其取在中间，可以主考，可以分房；其取在后面者，定为房差无疑。此亦理势所当然，不能任意营私也。乃考差者一遇无差，不怨己之不取，而怨军机。且放小差者不怨取之不高，而亦怨军机。翰林二百余人，得意者十之三，失意者十之七，为数不下二百人。怨气所积，谓以后种种祸变，无不因是酿成，亦似武断；而不知发端甚微，无形之影响，固甚大也。

同治初年，左文襄克复全浙，移师督闽。下车之始，百废具举。创立正谊书院，以课举贡，并选举贡之高才者，住院校刊《正谊堂全书》。宏开广厦，寒士欢颜，影事今犹在目。记院中撰一联云：“青眼高歌，他日谁为天下士；华阴回首，当年共读古人书”。文章经济，名重一时。而大乱之后，亟亟修



明文事，元老宣猷，其魄力之大，洵不可及。不谓此事只近在四十年，乃竟有人往风微之叹也。科举时代，每省有书院，定考课，给膏伙，教而兼养，意至美也。各省各自为政，而大致不差。今即以吾闽书院言之。省城旧有三院：曰鳌峰，曰凤池，曰越山，所以课生童也。鳌、凤督抚主之，越山则福州府主之，谓为郡书院也。又曰龙光，所以课驻防，则归将军专主。谓为八旗书院也。外府县仍各有一二。同治年间，左文襄立正谊堂，招举贡校书，旋即设立正谊书院。嗣是王文勤中丞（凯泰）抚闽，创立致用堂，旋改为致用书院，专课经学，却不限课举贡。其掌教名为山长，皆以乡先达退宦者为之，虽论辈分科分，亦必以品学为重，此亦古者祠禄之意也。其束：鳌峰八百金；凤池六百；越山二百四十；正谊八百；致用亦然，间或一千，则记忆不清矣。其膏伙：鳌峰生员内课二千三百，外课一千八百；童生内课一千三百，外课八百。凤池略逊，越山则只数百而已。正谊内课四两，外课三两；致用亦同。每月官课一次，另师课两次，应官课不应师课，则分扣其膏伙。官课另有奖赏，其额数奖银，皆随官之丰啬。师课三名前亦有奖赏，但出于额定，为数甚微；膏奖细数记不甚清，但不失之远耳。正谊专考举贡，人本无多，而大多数之寒士，除教读外，皆以各书院为生计；然得之不得曰有命。别无所营谋，亦绝不〈毛冒〉〈毛〉也。世人以颜子为不学而致，吾则以为当日之书院生，未尝不知箪瓢之乐也。今日追思，分明是三十年前事也，琐琐记之，俾后来人知其来历焉。

光绪廿七年七月奉旨：著自明年为始，乡会试改八股，试策论。八月奉旨：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外，各省所有书院，于省内均改设大学堂外，府厅直隶州均改中学堂；各州县均设小学堂；并多设蒙养学堂。行之未久，又于三十一年八月，准直督袁世凯、鄂督张之洞、江督周馥、粤督岑春煊之请，谓科举不停，民情观望，著自丙午科为始，所有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。科举废而学堂大兴矣。乃奉行者人不一心。规制不能整齐画一，而所云教育普及一语，又徒托空言，不得谓非始谋不臧也。

余二十七年守抚州，于奉诏之先七日，即改兴鲁书院为抚郡学堂，置普通精舍，以居高才生。“普通”二字，余以意为之，初无所沿袭。后数年，乃有普通学、专门学之区别。盖当时草创，学制固未备也。回任建昌，新创郡学一所，甫落成，即奉讳去任。及到苏州，以他项学堂已多，乃创立农学堂。三年，有自外洋学农学专门归者，聘为教习，乃告之曰：“农学以选种杀虫制肥为要素，宜按程序分浅深教之，以资实效”。教习曰：“吾所学乃农理化学，不能一一实验也。”余心非之，而无可改聘。开学几及五年，而现象如此。政变后，余不复管学务，二十年来如何更变，则不复与闻矣。虽然，余岂得谓为无罪哉？

当民国元二年，机关林立，学生得事较易，而俸薪皆百数十元不等。今则事少人浮，而谋事者仍不肯贬格小就。余告之曰：“我初到建昌时，于江书院生员膏伙月六百文，童生三百文。余嫌其太薄也，乃捐廉加倍给之；汝们月得千二百文，或六百文，皆喜形于色，优游过日。今有十余元馆地，个个以为不满意，是何以故？且汝们江西省城，从前有友教书院，山长束年只二百四十金，虽加以官场津贴，为数亦有限。而为山长者，多系退老督抚。试问：当日太平时代，读书人之享用，不过如此；今者国债累累，度支几竭。必欲每人之得馆者，非百数十元不可。试问钱从何来？后何由继哉！”然此犹为余在江西时言也。近则累年匪扰，流离颠沛，情形直不堪问矣。

科举时代，悬一格以为招，人人各自延师，各教子弟，国家亦不必人人之为延师也。学堂制兴，官立学堂，是官为之延师也。官力不足，失学者多，于是合群力而为私立学堂，是私人代为之延师也。私人之力又不足，失学者仍多，于是有力者自费出洋，以辅官派出洋之不足。费巨额隘，其失学之多，仍如故也。中国人民之众，失学之数，至少亦在百与五之比例。此九五之数，国家欲扩充学堂，徐补此阙，力必不足；若用强迫手段，使此九五之数各自谋学，势更不行。且今日学堂之弊，不止在失学人多也，即不失学之人，亦无以用其所学也。论者谓宜广开工厂，每厂必开一学堂；某厂用何项人才，即招何项学生；从前所有毕业生，即按其所长，各归各学堂掌教，或补习。如此，则已学者无弃材，后学者有出路，而国家亦可省一无限量之学费，一转移间，全神俱振。策无有善于此者。至于法政一门，专为作官吏之用，近时既不重官吏，如有愿学者，即可照从前科举之例，各自延师，听候官为考校。如此，则从前法政人才，亦不至无所安置也。所言亦自成理，但所行能否实践所言，所言能否有效，则在办事者之善为措置耳。

今日学堂之弊，与学生无与也。而当时兴学者，急于观成，仓猝定制，人不一心，适蹈不知轻重之弊也。一在毕业太易。科举时代，三年一会试，取进士三百余人焉。三年一乡试，各省统计，取举人约二千人。五贡并不及此数。进士固即时任用，而得意者尚不及半。举贡分途，消纳十不得一，日积月累，后来已拥挤不堪矣。今改科举为学堂，大学毕业视进士，中学毕业视举贡，而且无人不可毕业焉。今默揣其数，试问何以位置？一酬报太丰。前清大学士，年俸三百六十两。而从前出洋毕业回国，当轴极意优待，年俸视大学士十倍且有不止，其次亦必五倍，后难为继，向隅者多。此二者皆视之太重，而势处必穷也。一备索学费。从前寒士读书，无所谓学费也；且书院膏伙，尚可略资以津贴家用。今则举学中田产，悉数归入学堂；而学生无论贫富，一律取费，且膳宿有费，购书有费，其数且过于学费。其出洋之由于官费者，寥寥无几

，其自费之费，即千金之家，亦必裹足焉，是出洋生不得有寒士矣。一不恤生计。学生之弃家产，负重债，以期毕业者，不过求出路以取偿耳。今对待学生者，则曰：“学生之头角峥嵘者，不难自谋其生，历次考试，亦有任用。即不然，亦得有学位，则亦已矣。不观当日之秀才乎？秀才中举中进士，固有出路；若终于秀才，则亦有秀才顶戴荣身也。有何不可？”不知当日秀才无资，本无产可破；今之秀才，则大半自破产来也。此二者视之太轻，势穷而变，不易通也。噫！始谋不臧，其由来非一朝一夕之故，今之办学之人亦不任咎也，无己，其仍证诸外国乎？外国学生失业，亦必恐慌，当有补救之法，取其所长可也。近来有大政策，必合中外谋之，此亦时势所趋，无可解免也。

### ●卷三

财政前清由户部专管。户部之库，余在京时，奉派随同查过四次，出入互有盈绌，盈时不过千一百万以外，缩时亦不过九百万以内。承平时，度支有常，而典守有制，每次查库，必报盈余少数。此部库也。至外省亦有省库。苏州有藩、粮二库，余任首府，凡遇巡抚司道交代，每年不止查过一次，为数不过数十万，间有过百万者甚少，缄藏严密，毫无假借。此省库也。江苏算是大省，而所藏不过如此，则小省可知。计部、省各库，计算不过三千万，视乾隆时部库尚存七千万者，殆已不及，中国可谓贫矣。今则改库藏为金库，而金库则由国家银行代理之，有亏无存，每况愈下矣。

中国自同治元二年之后，十年生聚，渐复承平。官俸俭薄，兵饷节缩，取于民者，只厘金不能即除为弊政，此外仍恪守“永不加赋”之祖训。国用不足，推广捐例以卖官。疆吏有议行屠宰税者，人犹唾骂之。医疮挖肉，不免拮据，然未敢轻易借洋债也。乃甲午一败，赔款二万万。当日京官，震而惊之曰：“此二百兆也！”赔款各省分摊；摊解不及，即须借债以补之。庚子又一败，赔款四万万。于是亟行新政，藉新政以取民，藉新政以借洋债。京官又推广登进之路，于是富商大贾，遂辇载以求仕进，官常弛而奢侈之俗兴矣。丙午夏，余服阙到京，葛振卿尚书（宝华）对余言曰：“君知我国新打一胜仗，有人赔我四万万乎？”余曰：“何说？”渠曰：“若非赔我四万万，京官之阔，何能如此？君在外九年，岂料世变如此之速耶！”其时亲贵尚未横行，而祸根已暗长矣。旋而亲贵日盛一日，京官亦日奢一日，不数年而国亡矣。亡国之后，项城初到，即定为京官，无论大小，每人月俸六十元。然即如此，已较前清宫俸倍蓰矣。后乃变更平余办公诸旧制，名为化私为公，实则骤增政费。又有所谓善后借款五千万，以为挹注，而京官又肥马轻裘、狂嫖大赌矣。是河山方以奢终，功名复以奢始也。项城在洪宪以前，虽以洋债为挹注，而尚有眉目，至洪宪后，大动天下之兵，军费无所底止，而政费随之而滥，遂更感拮据矣



光绪末年，户部册报，岁入一万万零八百万。迨项城时，逐渐加增，岁入已逾四万万。或云，所增之数，外债及学生学费均算在内。实在岁入之数，亦总在四万万矣。此四万万仍由民间所担负也，是人家年用百金，今则年需用四百金矣。此余在江西时所言也。今阅财政部报告，二十年度，岁入已在六万万以外；且只就国家税言，而地方税田赋大宗等等，尚不在内。虽以元易两，而大数已甚可惊。政繁赋重，民不堪其忧，岂空言已哉。

从前内债，有所谓征信股票等名目，后以捐照抵还，遂失信用。而外债则不然，后因屡次展期，抵押品有名无实，信用亦失。外债途穷，仍返而求之内债；内债途穷，乃减折以招徕之，卖时减折，还时十足。此饮鸩止渴也。然此法外国实开其先也，外国量出为入，借国债为挹注，取便一时，今日经济恐慌，势已将穷矣。中国尤而效之，而尚未甚，岂可不审慎从事哉？

从前各国通商，我以丝茶出洋，获大利；而外洋以鸦片进口，亦获大利。后外人自制丝茶，我之丝茶减色；而我自种鸦片以抵制之，外洋之鸦片亦何尝不减色。且外洋之制造品进口日新月异，而我之天产出口亦日新月异，近来之仿造洋货又复不少，特外人进步速，而我之进步迟耳。今则外国工商恐慌，百计倾销，商情大变，成败不可以道里计矣。

通商以出入货之盈缩为利败，此显然者也。光绪末年，与一德人谈，则谓：通商系两利，比之于水，水未有不平；所谓盈绌者，必有所救济，不能执一而论也。我德国输出，即绌于输入，不足为虑。譬如中国无银矿，市上银洋流行，从何处得来？乃证以《海关贸易册》：中外通商，惟同治三年，出超为二万七千万，为最旺之数；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三年，此五年内，出超已降为一千万有零；自光绪四年以后，直至二十六年，逐年递降，均入超于出，其甚者将及一万万。当时德人坦然言之，自必确有所据。今则超入之数，竟有七与一之比例，则水之不平甚矣。其崩决之势，不大可惧哉！

田赋按则定税，本有标准，乃日久弊生。有清入关，即欲矫明之弊而行清丈，因循二百余年，而不能行。只以土地太广，粮户太繁，税则又参错不一致，以致一国之中，完欠互异，不平已甚。县中册报岂能捏饰？而综核殊难一目了然。余外任廿余年，每到一县，必与县宰闲谈，问其所辖田地，每亩若干弓，完粮多少。皆猝不能对；即对，亦言人人殊。迨饬吏开单，有数十亩一户，有一亩不止一户者，且亩不一则，则不一粮，一篇细账，不糊涂而亦糊涂矣。此吾亲历之事。苏、赣钱粮完欠，不能平均，而深痛整理之不易言也。近日财政会议，力求田赋平均，可谓知其要矣；但望无徒托空言也。

古者取民有制，田赋之外，常税而已；今则无税不增，而田赋转成为少数

矣。古者理财，量入为出；今则量出为入矣。财政部计算表勉强符预算，而田赋一项尚归诸省税，只国税收入已逾七万万矣。财政部专管收支，而代财政部而收支者，尚无帐可算。锱铢所入，何一不取之于民？语云：“暂累吾民”。民果何时而释此累乎？居今日而言，理财非裁兵不可，然兵何能遽裁也？抑欲裁官乎，官亦何能遽裁乎？兵与官俱不能遽裁，则政费之浮滥者，独不可减乎？然所减亦有限矣。且更有一说，官场所浪费者，仍有利于工商之民，正可以资挹注。此说乡人自乡来者，言之历历，尚非持之无故，然亦何能成理也。司财政者竟言无办法，诚哉其无办法，然环顾外国，亦何尝有办法也。支出无艺，国债日增，其病皆中于军备也。列强乃急急于经济会议，冀欲于商务补苴。既曰会议，则必各得其平，非专顾一国也。此议何时可成，大抵终归于各求省缩而已，各谋苟全而已，勿徒骋高论，而自欺欺人也。

米为民食所资，宜流通也。自禁米出口之说起，而百弊生焉。余初次到赣，在建昌时，米价贵过二千，绅士以米谷出境太多，须厉禁，以恤平民，余许之。旋有谢、梅两老绅士，来言此禁宜弛，否则恐米价更贵。余召请禁之绅士诘之，乃对曰：“谢、梅两富绅米多，利得厚价，所言全是私意。”余亦颇信之。越数日，米价果更贵，且河下因拦米闹事者亦多。查知禁米之令一出，刁生劣监即率人在河下拦米船，得钱仍放行，有健者不肯出钱，即互相斗讼；且索钱不止一处。米价遂因而加贵。后乃知请禁之绅士，即缘禁作奸之刁劣所指使也。此江西一郡之事也。旋守苏州，省会之地，密迩上海。上海有一秘密公司，实一大米蠹也，有一般人联洋人买办为之。闻其资本数百万，春间放债与农民，秋成收米，故全省之米大半尽入此公司之手。米价涨落，归其操纵，有时创为禁米出洋之说，或又弛禁，皆为该公司所利用，官为傀儡而已。盛杏荪未为尚书时，告余曰：“中国尚食西贡洋米，那复有米出洋？”一语可以道破。彼纷纷者，殆别有作用欤，盖暗指此公司言也。有一日，苏州米价将涨过十元，扬言非涨至十二元不止。余以此弊全在上海，乃往上海与绅商筹平价之法，告之曰：“我在建昌时，米价过二千，即闹饥荒。相隔不过六七年，何至世变如此之速！苏州产米之区，且今年又非荒歉，米贵更无理由。我有一主意，今年苏州米价不许过十元，如不遵令，苟地方抢米店，我官场不负责任。哱诈之言，我总不听！”嗣后价亦渐平，殆该公司知我已烛其奸也。此苏州一郡之事，亦即上海一埠之事也。改革后到江西省城，虽无上海之大米蠹，而米商买卖之大，亦为人所注目。江西产米有余，只临川一县，年可余一百万石，势非出口不可。议会复开，乃当日刁劣拦河之故态复萌，怂恿由会建议禁米出口，官场无可辩论。后米商向议会暗中疏通，便复议弛禁。一年至少总有一次开禁，一次弛禁。其后军事迭兴，金加重，上海价低，出口无利可图，虽不禁而

亦不出，与禁不禁毫无关涉也，此江西一省之事，又非徒一省之事也。总之，米谷如水之流，全国可通。价之贵贱，非有特别事故，不能过于轻重，禁令只助涨价之弊，绝无平价之效。此余外任多年，真知灼见，可以断言者。然后知剖斗折衡之说，庄子亦一大政治家也。

苏秦之客于秦，米贵如玉，薪贵如桂，谒者可恶如鬼，秦王难见如帝。后见秦王，乃曰：“臣食玉炊桂，因鬼见帝。”诉其作客之苦，苏秦去今已二千余年，犹今日米珠薪桂之窘状也。厥后治乱相乘，物价之低昂，人民之苦乐，不知经数百变，无可殫述。但以吾身亲见者言之。南人食米，北人食麦，此其大较也；北人兼食杂粮，南人亦有兼食薯芋者。余少时不预家务，但闻米一石二三千。光绪三年到京，米一包二两四钱，折合一石，则为三两余。光绪廿三年到建昌，米一石不过二千，边县则只千二百文。乃调南安，山多田少，地近粤边，米石八元，多者十元，与内地价几逾倍。光绪季年到苏州，产米之区，价亦七八元，间有至十元。甲寅到赣，米石以四五元时为多。壬戌到沪，则米十元以外，间有近二十元矣。大抵米价之高低，除僻地以丰歉为转移，其都市之处，皆操纵于米商之手。其因禁生奸，因税滋弊，皆由米商消纳之而入于米价。是米价定于商，不定于农也。是亦筹民食者所当知也。

矿产布天下，所谓地不爱宝也。然开之，或得或不得，即或得之，或衰或旺，或始旺而终衰，或始衰而忽大旺。此变化不测，殆有天为之主宰，而矿师之明昧，特为天所驱使耳。中国年前，山西煤矿中外喧传，谓可采至千年不竭也。随声附和，哄动一时，某巨公乃与外人合资，开采煤油矿。不二年，各亏巨本而罢。当初如何合资及亏本后如何分任？事属既往，不必深求，然山西矿名一败涂地矣。即汉冶萍煤矿，何尝不亏本，特以供给日本，取用未即废耳。他如漠河金矿、€南铜矿之类，其衰旺情形，互有不同。大概不过养活一时矿工而已。若外国矿主所称为大王者，百无一二，其失败者亦不少。无他，天生田以养农，生矿以养工；田之利薄，故使之长享其利，矿之利厚，故特为之限制。其实酌盈剂虚，工之利又未尝不薄也。天道恶盈，冥思之，适见造化之妙而已。

《易》曰：“明慎用刑。”历代虽除肉刑而未净绝。民国新刑律，改大辟为枪毙，即笞刑亦废，可谓法网宏开矣。虽所定刑章，间与国情格，然苟折狱惟良，尽可徐图补救。惟滞狱貽累，已足上于天和，所当深戒也。

民国法律，视前代为宽。然历代法律，虽不免有苛细之处，前清法律亦未尝不然，而臬司及州县衙门，必竖一牌坊，书“天理国法人情”六字于其上，谓必合天理人情，而后成为国法也。语云：“立法严，行法恕。”又曰：“行法须得法外意。”古人之言深远哉。



狱讼之兴，不外酒色财气四字。民之求理于官者以此，官之取信于民者亦以此。而不知四字之中，以气为主，而色亦大有关系。淫为万恶之首，谚曰“色胆包天”。余外任二十余年，乃知所有命案，多系因奸而起，谋财害命却居少数，谚所谓“十命九奸”是也。其盗案亦有因奸起者，定狱时则从其重者处之，而不以奸情牵混也。赌可倾家。无家可倾，非出于窃不可，窃案所以多赌徒也。盗案亦有因赌者，小赌则窃，大赌则盗，定狱者亦从其重者处之，不以犯赌牵混也。至于饮酒亦有滋事者，然止于斗殴而已，其涉于命者，亦误杀斗杀而已，非重大命案可比；且饮之费究不如赌，亦不至遽流为巨盗也。此亦民情之大可见也。

户婚田土之案，从前归于钱谷，今则曰民事诉讼，皆为钱而已。金钱万恶，争钱必争气，讼案所以易涉货贿也。钱谷幕友，操守每逊于刑名，官场轻视钱幕，亦即为此，然而贪吏喜之矣。吏虽不贪，而有藉之为傀儡，于中取利，而吏亦不免贪名。是则贪吏之所喜，亦即廉吏之所惧也。故《牧令全书》谓：“钱谷之案不能轻断，断则必翻，不如委之公亲调处，而翻者却少。”此即《易》象所谓君子以明慎用刑，无敢折狱之说也。

潍侄既到彭泽任，恶民情之刁，讦告之不易防也，来书问补救之法。余告之曰：“汝自命法政家，能断案耳。殊不知词讼一判曲直，便有一德一怨。汝断百案，便有百个怨家，怨家哪肯说汝好话。吾此言非教汝不断案也。真正刑事之案，却宜迅速断结，如果处当其罪，而又出以哀矜，则民亦何怨！所最宜慎者，民事之案耳。户婚田土，头绪纷繁，情伪百出，人各绘一图，各持一据，目迷五色，从何处说起！是非使之调处不可。《牧令书》曰：‘公庭之曲直，不如乡党之是非。’此调人之职，所以为世重也。”《牧令书》虽多门面语，不必尽合事实，然此数语却可诵。调处不了者，官岂能不断？但少断案，总少怨家也。吾生平听讼颇不让人，今为此言，岂尽滑稽哉！

乱世官威易行，平世官威转损。官之威，亦恃力为之助耳。乱世官以武助力，虽甚贪暴，民纵智，不能与武抗也。平世官以法助力，民之智，正可缘法生奸。吾平日不喜谈禁令者，即是此意。语云：“下民易虐。”此亦指良懦者言耳。然民即良懦，而其旁有不良懦者，指而导之，亦何曾易虐哉！盖民之智多，不特廉吏难为，即贪吏亦何曾易为？不特循吏难为，即酷吏亦何曾易为？古之称廉吏、循吏者，临行卧辙留衣，旋而立祠立传，何曾非此多智之民操纵其间，而运用其智乎？

《书》曰：“民可近，不可下”，《诗》曰：“顾畏民{品石}”，从古民气固不可侮也。自政衰官横，士之黠者，挟民气之说与官抗，而官败矣。官不甘于败也，乃挟兵而与民抗，而民败矣。民又不甘于败也，挟匪而与兵抗，而

兵又败矣。兵亦不甘于败也，通匪而与民抗，则民更大败而特败矣。其实官也、士也、兵也、匪也，其始皆民也。民之黠者究少数，不黠者究多数，相持日久而无以了局，黠者悔矣，不黠者亦悟矣。其始之抗也，势胜而理拙；其悔而悟也，理胜而势拙，理胜势拙，天下太平矣。此亦古今治乱之机也。

孔子曰：“道之以政。”以政则不能无禁令，禁令愈严，而缘法作奸者，滋弊必愈甚，此以政不如以德之善也。余外任廿四年，除禁烟及禁假命案外，绝不悬一禁令。明知佐贰杂职，皆藉例以收陋规，余只考察僚属，不使滥索，绝不容缘法者得以售其奸。此意稍明治体者亦多知之，非谓余有特识也。即以余所禁二端而论，禁假命案只在官能廉明，权自不至旁落；禁烟则以国际关系，不得不锐意行之。然不料继吾后者，破坏灭裂，一至于此也。

中外交涉，译署总其成，而教案则地方官之责也。教民播恶，鱼肉平民，余守赣九年，适丁其厄。百计镇压，终未得当，抱疚在心。嗣义和团起义，仇教号召，不无鹵莽。外人以杀使辱国，藉保教为名，联军入京，索赔巨款，协定苛约，而始退兵。因是而教<滔炎>愈张，民怨愈甚，不数年，遂有南昌之变。南昌之案，外人实无戕官之事，兵舰一到，自满所欲而去。然外人从此亦大有觉悟，知教民之不可袒也，乃隐将教权裁削，禁教士不得干预讼事，而数十年之教祸息，而民脱水火矣。然外人初无明文宣布也，余到苏州时，见教士之不入公门，后始<sup>レ</sup>知其故，此诚中国教祸起灭之大转机也。

中国外患内忧相迫而至。然环顾海邦，仍各有岌岌自危之势，甚矣纷乱之已造其极也。此何故哉？天祸中国，天不止祸中国也，环球生计均感穷蹙，相逼而成也。试问今日何国之民得安居乐业者，恐未易言。多难兴邦，殷忧启圣，有国者所当上下觉悟，而谋所以转祸为福也。一国一党之争，皆局部之事，无关于大本也。

邵尧夫闻杜鹃，有南人作相之惧；宋高宗有“南人归南，北人归北，朕何所归”之愤言。中国人本有南北之意见也，当国者持同轨同文之旨，极力维持，苦心消弭，不得谓毫无政策。明清两朝，各得延祚二三百者，以割据偏安之祸根斩除殆尽也。清季议立宪，又有联邦自治之说；旋以南北争持，又有南北分治之语。不知联邦自治，是须邦邦备兵也；南北分治，是须南北各备兵也。近世殫一岁之所入以养兵，犹且不给，况又分之乎？北方地广民贫，南方地狭产富，以南济北，相安已久。且川之济滇黔，粤之济桂，浙之济闽，所谓妥协省份者，南之中又相济焉，此理财之关系也。袒护同乡，悬为厉禁，本地人作本地官，亦悬为厉禁，故人才相资，四海皆为兄弟，无相猜忌。今曰自治，是此省之人，不能治彼省，甚至此郡此县，不能治彼郡彼县，是一郡一县之外，不相来往也。中国一千九百县，是分为一千九百国矣。外人不来瓜分，自

己先瓜分矣！且一县为一国，是一千八百九十九国，皆敌国也。敌国相侵，乱岂有定乎？此又用人之关系也。然则中国不统一，其可能乎！今国难急矣，慎勿再搬演名词，徒乱人意也。

《诗》曰：“既克有定，靡人弗胜。”言天终有定时，终有胜人之时，且环球并无二天，天管中国，即环球各国无不管也。譬如天道恶盈，今日各国机器发达极矣，而天以工商恐慌警之，即天之恶盈也。天道福善祸淫，中国军阀当日狂嫖烂赌，而天以屡次覆败警之，京官当日亦狂嫖烂赌，而天以变作灾官警之，即天之祸淫也。天之阴鹭下民，其舒惨迟速之数，固有示人不测者。莫谓天网不漏之说之不足信也。

党派纷争，政局不定，无他，政不在养民而已。然昔之养民也易，今之养民也难；昔之养民也省，今之养民也费。何以谓之费？今日之势，非裁兵不可。未裁之兵当养，已裁之兵亦当养，且未为兵之人，尤不能不养，则养之费岂能堪哉！舍之不养，则战祸复起，广取民财以养之，则流寇亦必起。为今之计，非大借外国之财，大举建设不可。大举建设，则无论旧人新人，皆有所安置，而小民亦得以沾其利，岂不皆大欢喜乎！且痛减赋税，以旧日正供为度，专办旧日之政。如此，则政不繁，赋不重，物价大贱，而民不胜其乐矣，岂非一举而数善备哉。然欲借外人之款，必先量外人之力，欲量外人之力，必由大局之定而生。然则大局岂能长不定乎？外国亦不能不同负此责也。

华侨散处各地甚多，而能拥资成业者，究以南洋为盛，而发达亦最先。从前寄款回国，络绎不绝，今则外国工商恐慌，同受影响。能举华侨之产，而救祖国之贫，杯水车薪，亦属无济。然人数究众且多，不忘祖国；其致力于实业，经验亦富，国家如果善为招徕，则源源归国，于国力亦不无小补也。

入其疆，土地辟，田地治，养老尊贤，俊杰在位，则有庆；入其疆，土地荒芜，遗老失贤，掎克在位，则有让。庆，赏也。让，责也。此古者天子巡狩诸侯之制也。今观列国，其田野荒芜，遗老失贤，掎克在位者无论矣。乃有地无旷土，野无游民，而且市肆繁盛，日用优美，其国事则谋之元老，庶政则合之群策，不失养老尊贤之意，乃观其国中，人心不定，仍岌然若不可终日者。此何故哉？盖霸者欢虞之民，日久不能相安无事也。然不能相安，又何能终于不安哉？识者有以知其不然矣。

列强备战，战机逼矣。子独言不能战，何也？曰：“各国皆穷也。”“穷何以犹备战？”曰：“半以备国防，半以空言威胁，而欲以柔道制胜也。”曰：“此策不行奈何？”曰：“逼而再一战，亦暂时事耳。且战之胜负，亦无把握。”“绿气炮极猛烈，不恤人言，非不可以借一乎？”曰：“如用绿气炮，则人类必绝，乾坤毁矣，天固不许也。”“然则专用飞艇乎？飞艇价省而效



速，横空飞翔，多多益善，不可以一逞乎？”“然一利器之出，科学家必另制一器以破之。闻近来甲年所造之艇，乙年即不能用。前途危险，正未可知。当日奇肱国作飞车矣，飞车与飞艇同，飞车果可利用，可以至今不传耶？战胜本侥幸之事，况胜一无所利，败则必至亡国，恐列强必不为也。”

韩非子说十过，九曰：“内不量力，外恃诸侯，则削国之患也。”十曰：“国小无礼，不用谏臣，则绝世之道也。”不量力而徒恃外国之助，国必至于削，此固然也。而按之近日时势，却不尽然。欧洲多小国，而间于大国，却赖各国联盟，得以均势，而免于削。惟国小必弱，即有礼于大国，如非均势联盟，岂能免于侵侮！则谏臣之审时度势，固不宜轻发议论，而使臣之御侮折冲，又岂可不慎重其选哉！

#### ●卷四

余生于咸丰五年，正值大乱。至十二岁而各省肃清，廿三岁到京时，完全一升乎景象。《传》云“十年生聚”，其期固不爽也。今日各省民生涂炭，不亚于咸同之时，特不知何日可生聚耳？

《孟子》言：一治一乱。易卦于剥之后，继之以复。今固乱时也，乱必有治；此固剥时也，剥必有复。古人有见于此，著经世之书，以待将来，不以世乱妄自菲薄，徒忧伤憔悴以终。语云：“天下自乱，吾心自太平。”诚非无所见而云然也。

局外说闲话，天下无难事；事后说闲话，古今无完人。此四语，吾幼时闻之父执杨陶径学博森藩所言也。其人皓首庞眉，丰采焕发，议论风生。常到我家，所谈皆足以动听，惟此四语余牢记在心，至今不能忘。后生小子动辄开口骂人，亦自成其天相而已。

孙夏峰云：“勿系恋既往，勿悠忽现在，勿希冀将来。”此三语吾屡屡举以告人。看似甚浅，然苟能力行此语，则不知心地要何等干净。吾老矣，从前所做之官，与所用之钱，绝不介意，即所谓勿系恋既往也。目前只守勤俭二字，应做事必做，应读书必读，即所谓勿悠忽现在也。至于后来之功名富贵四字，绝不著梦想，即所谓勿希冀将来也。人以我之顽健，谓为善于养生，其实皆得力于此三语也。

名不可以太盛，盛则易惹是非；权不可以太重，重则易丛恩怨。周孔之圣尚且不免，况其下者乎？今而知巢、许之清高，老、庄之冲逸，亦自有千古也。

孔子之美柳下惠也，只述其三黜不去之言，此外不著一字。所谓欲求其遗议，则亦无形，诸叹赏，则已赘也。若论孔文子之不耻下问，许之为文，称其一节也。论臧文仲之居蔡，明其非，知不宥其一眚也。圣人臧否人物，且有权

衡。今之论古来人物者，震其功名，便极意揄扬，不留遗议；而于其薄眚微瑕，不惮曲笔而为之讳。夫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？如谓建功立业之人，无一非循规蹈矩，是曲避吹毛之嫌，转失纪事之实，何以昭示后人哉？夫不矜细行，终累大德，律己之严，隐恶扬善，执两用中，察言之知也。而于论世知人之旨，固有间也。

香山诗曰：“胸中无细故。”放翁诗曰：“不思明日事。”此语看似平易，细按之，即主静之学也。人到老而闲退，则目前之事，何一非细故？即非闲退，而浮生若梦，一生之功名富贵，又何一非细故哉？明日之事，今日岂能预定，思之何益？苟知此意，即此是学也。

王仁禹翁曰：“上山则惫，下山则快，以下山之快，偿上山之惫，不如平地之安也；曝日则热，浴水则凉，以浴水之凉，解曝日之热，不如就阴之爽也。”此平易之言，亦即以静镇躁之意也。

吕新吾曰：“嗟夫，吾辈日多而世益苦，吾辈日贵而民日穷，世何贵而有吾辈哉？”此才算是有责任之言。今人动曰：“天下安危，匹夫有责。”试问比年以来，百姓日苦一日，日穷一日，果谁使之，孰令致之，试问何以自解？

语云：“虽万不可却之情，求屡亦厌；虽万不可抗之势，逼极亦争。”又曰：“有情不可讨尽，有势不可用尽。”此等阅历有得之言，求之近今之人，似未有见得到说得出者，殊不慨也。

朱柏庐曰：“人有祸患，不可生喜幸心。”盖人有祸患，本是自作之孽，然安知无冤抑之时，若幸灾乐祸，岂不有伤忠厚乎？况生当乱世，人之苟全性命者，殊非易事，其身遭不幸者，何可倭指？此孔子所以不尤人而悯人之穷也。

《大学》曰：“为国者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。”是利须辅义而行也。今人亦云：“有权利，须有义务。”亦未尝惟利是图也。然利而曰权，是利所在，即权所在也。史迁曰：“贪夫殉财，夸者死权。”曰殉曰死，同一死路也，是权利直可作权害解也。人之争权夺利者，抑何知害而不知避也。

吕新吾曰：“且莫论身体力行，只听随在聚谈，曾几个说天下国家、身心性命、正经道理？终日哓哓刺刺，满口都是闲谈。吾辈试一猛省，士君子在天地间，可否如此度日？”此言诚是也。但今人动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语为藉口，逞臆而谈，祸人家国，卒之党派纷歧，闹成内乱不已。噫！人心世道之忧，是岂新吾所及料哉！

西人谓孔子为大政治家。吾自外任后读《论语》，便与幼时意境大不相同。新吾《呻吟语》，非徒讲学也，其论治处尤为真切有味。陈文恭所著《从政遗规》，亦语语著实。吕、陈相距百数十年，其体悉民情，多若合符节，然即

证诸《论语》所云，亦何尝不一一吻合。无他，同是中国人，古今固同此性质也。今日欧风东渐，国体更变，谓将来人心世道，必异于古之所云，则亦一种疑案也。

人之言曰：“天下不患无才。”噫，此言缪矣。《书》曰：“官不必备，惟其人。”此言三公之任事至重大，非用当其才不可，安得不以无才为患。若百僚庶尹府史胥徒，以无关轻重之事，择无足轻重之人之为之，何至有乏才之虑。而不知无足轻重之中，亦必有所谓稍足轻重者，此其人亦非头脑稍清晰，事理稍明白者，不足以当之。所以临事用人，每有人待事、事待人之叹，殆非更事较久者不能知此苦也。

人生世上，闲忙两字而已。吕新吾云：“耐苦易，耐闲难。”吾今日觉闲中大有佳趣，无须耐矣。可见人只知有忙，不惯有闲也，不知忙字害事殊大。语曰：“无事忙。”曰：“忙中有错。”又前人诗句：“举世尽从忙里老。”又：“诸公袞袞登台省。”袞袞二字，写热官之忙尤为深刻，皆极言忙之无益有损也。吾作闲人久矣，每笑世人之忙，然不知不觉，仍有无事而忙者。稍忍须臾，往往事有变化，便觉忙之无用。老来随事体验，每有所得。程明道云：“闲来无事不从容。”吾今日亦觉从容之有佳趣也。或曰：“民生在勤。”不忙岂非不勤乎？不知勤与忙大有区别，有当为者不得不忙，忙适以得闲也；若司为可不为之事，无所不用其忙，事后思之，未有不悔其赘者也。

吕新吾言：“古人有五省之法。一曰省作书，免人厌于酬答。”余固以此说为然。而平日则又以“案无留牍，家无长物”八字自课。所谓牍者，非指官文书言也。在官之时，凡亲朋之问候，及有求于我者，无论贵贱贫富，皆无所不答。尝谓：人之问候我者，与我有情也，若不答，岂不绝情乎？人之有求于我者，必其情之迫，冀我有以慰其情也，我不能尽副所求，或安慰之，或婉谢之，均无不可。若不答之，岂不拂人情乎？退居之后，朋笈亦寥寥矣，凡有一纸之书，必量其人之平素、与其来意之诚否，如量应付。如其素心可托，谈老态，数往事，亦足以慰寂寞。且穷乏求我者，勉强应之，惠而不费，亦偶有无心插柳成阴之妙。若概以老嫩自诿，是适成一炎凉中人矣。

语云：“不妄花一文钱，便不必妄取一文。”意本以戒贪也，其实亦以救贫，且可以敦品也。语云：“饥寒生盗心。”官有廉俸，何至饥寒，若非随意挥霍，何至非所取而取哉？非所取而取，岂非盗乎？即非为官，凡强占人便宜，及借债不还，皆谓之非所有而取，皆盗也，皆妄用所致也。且“一文”二字，亦正不容忽过，一文可妄用，即千百万文亦可妄用。且更有一说，凡人今日所用之钱，明日试思之，有必要否，有悔否。若其必要，能勿悔乎？吾平日最恶守财虏，且极黷龚蒿人方伯财主财奴之言为漂亮，谓能用财则为主，徒守财



直奴而已。今忽为此言，亦以国人太奢，势将溃决而成大乱，不能无惧也。

吕新吾曰：“余参政东藩，日与年友张督粮临碧在座。余以朱判封笔浓字大，临碧曰：“可惜可惜！”余擎笔举手曰：“年兄此一念，天下受其福矣。判笔一字，所费丝毫朱耳，积口积岁，省费不知几万倍。”充用朱之心，万事皆然，天下各衙门，积日积岁，省费又不知几万倍耳。心不侈然自放，足以养德；财不侈然浪费，足以养福。不但天物不宜暴殄，民膏不宜慢弃而已。夫事有重于费者，过费不为奢；省有不废事者，过省不为吝。余在抚院日，不俭于纸，而戒示吏书，片纸皆使有用。比见富贵家子弟，用货财如泥沙，长余之惠既不及人，有用之物皆弃于地，胸中无不忍一念，口中无可惜两字。或劝之，则曰：“所值几何？”余尝号之为沟壑之鬼，而彼方侈然自快，以为大手段，不小家势。痛哉！余作课孙草，平日惜纸之事，取法于林文忠。其实幼读《呻吟语》，印在脑筋，故终身由之，初不觉其所以然也。

语云：“莠言乱政。”莠言非必邪说，即光明正大之言，不合国情，不应时势，毫厘之差，千里之谬，皆足以乱政也。泥《周礼》而酿祸变，岂非明鉴哉！

余当官时，每欲提拔一人，临时辄无机会，不得已，而谢却之。易一时，恰有机会，而其人又他去，不得已，而以不甚当意之人充之。又尝极力荐一人，十分注意而总不得当。他日，于不甚著意之人，随便荐之，而转如响斯应。屡试不止一事为然。曾文正晚年笃信运气，吾亦不敢谓人力之可胜天也。俗谚云：“有意栽花花不发，无心插柳柳成阴。”其殆天地无心成化之妙欤。

桑维翰言：“为宰相如著新鞋袜，外观甚好，自家甚不快活。”看似有责任之言。然宰相任大责重，身撻盘错，兢兢业业，自无快活可言。若太平宰相，忧盛危明，亦不能有侈然自放之一日。若说到外面排场，则浅之又浅也。

汉翟公，文帝时为廷尉，宾客填门。及罢，门可设雀罗。后复用，门庭又如市。公大署其门曰：“一死一牛，乃知交情。一贫一富，乃知交态。一贵一贱，交情乃见。”世态炎凉本属常事，乃积忿于心，而又宣之于口，稍有学问者必不出此。乃史录其言，几欲脍炙人口，非誉其美也，只足表暴其褊耳。

放翁《野兴》诗曰：“旧俗不还谁复念，古书虽在渐难凭。”此二语自系伤时而发。然旧俗有好者，亦有坏者，譬如中国往时婚嫁之繁耗妇女、应酬之无谓，殊可不必追念。至若古书纪载事实，时代变迁，本属无凭，譬如《朔方备乘》及《瀛寰志略》等书，当时海禁未开，谈经济学者均奉为至宝，及今观之，则殊多漏耳。至于说理讲学之书，则天不变道亦不变，虽一时难凭，终久必有可凭之一日也。

陈仲举“大丈夫当廓清天下，一室安事扫除”之言，谈气节者多韪之。不

知“廓清天下”，平治之事，“扫除一室”，不得谓之非修齐之事。略修齐而侈平治，宜其不善厥终也。宋儒曾议之。大抵汉儒尚气节，不免涉于躁；宋儒说义理，渐近于醇也。

人之寿数有定，而人之精神不能尽副其寿数。左文襄、李文忠晚年时，下半日竟异样糊涂，公事皆任幕僚为之，特藉其威望，支撑门面耳。盖其盘根错节，敝精劳神，过于常度，故颓败至此。而世之享大年，登大位，自诩龙马精神者，殆亦善于啬养，否则终日无所用心，故得此福欤。

俗谚“升官发财”四字，误人不浅。盖讲究做官，必不会发财，即不讲究做官，亦何曾会发财？使人人明此理，则天下太平矣。忆少时吾师林勿屯山长，由状元放知府，升至南巡抚。罢官而归，余囊仅有三千金。其时年事已高，谓年用三百金，分作十年之用，可以就木矣。谁知老而未即死，乃赖正谊书院掌教束修以度日。官至巡抚，不为小矣，其宦囊竟不足以送死。沈文肃自江西巡抚丁忧归，鬻字为生计，每书一联，仅取润资四百文。及起服后升两江督，始致书友人，谓今日皮衣方稍全备。官至总督，其衣服亦未能绰有余裕也。其实贪官污吏，丰衣美食，赫一时，竟有不待子孙败落，及身而穷窶者，亦比比皆是也。

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，始有曰“苟合矣”，少有曰“苟完矣”，富有曰“苟美矣”。苟者，将就之意；合者，聚也。玩“苟合”二字，可见未始有之时，分应流离转徙也。今之游食四方，流离转徙者，不可胜数，欲求苟合而不可得，而偏一一求完求美焉，则真不可解矣。

孔子曰：“周急不继富。”人到饥饿，不能出门户，死无以为殓，可谓急矣，则周之宜也。今之人，每以日用不充，挥霍不快，随意借贷，意以为取之外府也。及于至再至三，手癖惯而供应者亦厌矣。因是而流入穷饿者，不一而足。吾尝谓孔子不曰“周贫”，而曰“周急”，盖急固当周，若不急以为急，是周之适以害之也。

闽人多种兰花，每以兰花之荣悴卜家运之盛衰。而郭远堂中丞作言，独其说，意谓人家将兴，其家主勤，理家务细，至花木亦必不忘灌溉，所种兰花，自然茂盛。若败落人家，百务懒惰，荒嬉过日，何能顾及兰花，是兰花之荣悴，关乎人事，不关家运也。人生在勤，随事皆要体验，推此类言之，即修齐之义也。

语云：“役物而不役于物。”役者，奴隶也，役于物，是为物之奴隶也。今之讲究衣服，广购器具，甚至玩古董，买字画，是为物之所役也。孟子曰：“人役而耻为役。”夫为人之奴隶尚可耻，奈何为物之奴隶，而不知耻耶？近年景德镇瓷器盛行，大花瓶、大鱼缸尤为人所争购，无理可喻，只告之曰

：“汝买许多大瓷器，要想到革命时如何搬运？”亦巽与之言，非恶谗也。吾刻一小印，曰“无长物斋”，不特他物无长，即前后在赣十八年，家中瓷器，何曾破用，此固不能瞒人者也，此亦吾性之所近，非矫然为之也。

今人有旧家庭、新家庭之说。新者自诩开通，旧者自重礼教，以旧鄙新，以新厌旧，弄出无数是非。氓之蚩蚩，竟有不知适从之意。吾则别有一说以解之。《礼》曰：“七十曰老而传。”当未传之先，家事老者主之，子孙不得自专，谓之旧家庭可也。及既传之后，老者不能自理，传之子孙，子孙竭其心力，支持门户，自谋温饱，谓之新家庭可也。然此非调停之言也。门户既须支持，则图新不宜遽舍旧也。其实天道循环，新而旋故，故而复新，犹地球东行，不知不觉而变为西也。新故两字，本无界说可言也。

近人言：“有饭大家吃。”此亦愤一党一系垄断权利，故激而为是言也。其实吃饭二字，要大有分别，有家常之饭，有特别之饭。家常之饭，人人自食其力，且导其妻子，使各养其老，此无待多言也。若特别之饭，则钟鸣鼎食，非富贵之家不能享有，所谓得之不得为有命，分定故也。今不各安分而争，欲破格吃饭，是人人皆要玉食万方也，岂不率天下而路耶？科举时代，儒官以食苜蓿为生涯，俗语谓之食豆腐白菜；秀才训蒙学，资馆谷以终身，卒未闻大家有闹饭者。知吃饭之人必须安分，否则未闻有不乱者也。

曾文正当乱平之后，提倡家法，注意“书蔬鱼猪”。然当文正之时，欧风尚未盛行，提倡较易。若今日之奢俗靡靡，语人以“书、蔬、鱼、猪”四字，未有不斥其迂谬者。然当此欧风衰落之秋，各国失业者动千万人，虽欲求“书、蔬、鱼、猪”而不可得，而犹心醉欧化，强饰门面，将何以善其后哉？

余在江西时，江西人每与余言张勋家产三千万。余曰：“此事君未目见，自系耳闻，切不可随声附和。”我与张勋无一面之交，何必为之剖白？但此言一出，师长、旅长闻之，皆想做督军；营、排长闻之，皆想做师、旅长，大乱不可收拾，大家共受其祸果也。张勋抄家，余躬亲其事，南昌仅得二十二万（合他处所抄，却有百万），果也。军阀时代，师、旅长皆督军矣，营、排长亦半为师、旅长矣，其乱视张勋时将如何哉？江西人来沪，谓之曰吾在江西所言，今日验矣。试问：当时之言张勋者，于己利耶，抑害耶？项城之初登台也，京官无论大小，每人月俸限六十元。后有人倡重禄之说，一唱百和，哄然而起，于是一部之中，向用十人者，渐充至十倍焉，月俸十金者，渐加至数十倍焉。且有一人而兼十一差焉。肥马轻裘，般乐怠敖，而犹以为窘于挥霍焉。余尝代为之忧，谓盛极必衰，后难为继。果也，张作霖出京，郎曹荡然，而灾官之声洋洋盈耳矣。子贡曰：“赐不幸多言而中。”今观此两事，是使余多言也。



淫祠例所必禁。汤文正时，五通神惑民太甚，毁之，去其太甚耳。后此即无有继之者，非谓淫祠不应废也，亦以神道设教，究可以禁吓冥顽。且迎神赛会，究系以驱疫为名，即许愿求福，亦具忏悔之意。而依此为生者，资以乞胡口；连日迎赛，小贩亦得以资挹注。所谓弊未太甚，姑示宽大可也。非不知法令为何物也。推之僧道，及星卜巫祝之类，其不能不听其自生自养，何一不同此意。今者地广人众，国家又无大兴作以收养许多闲民，乃忽令九流三教之人，均须各归正执，别谋生计。生计何在？又无可确示，是徒托空言，立而迫之为匪也。文正亮节清风，死之日仅御一破葛帐，其事之可传者甚多。若禁毁淫祠，系当官应办之事，不必震而惊之也。

汉明帝诏曰：“昔曾闵奉亲，竭欢致养；仲尼葬子，有棺无槨。丧贵致衰，礼存宁俭。今百姓送终之制，竞为奢靡，生者无儋石，而财力尽于坟土；仗腊慳糟糠，而牲牢兼于一奠；糜破积世之业，以供终朝之费；子孙饥寒，终命于此，岂祖考之意哉？”余尝见北京出大殡，上海大出丧，其虚耗之费，诚有糜破积世之业，如汉诏所言者。汉诏亦古矣，今何以不异古所云耶？

王偶翁曰：“俗人佞佛者曰‘吾无他觊，愿来生不断人身耳。’此语最可味，全生全归，此谓不断人身，岂修斋诵佛所能到耶？惜其习而不察也。盖随年盛衰，血气也衰极而死，则渐尽矣。惟志气不与年盛衰，志气则义理之性为之也，年日迈而志气精坚，义理昭著，其人死为明神，生为贤杰。夫子云：‘夕死之可’，孟云：‘立命’，老云：‘不亡’，皆是也，此不断人身者也。若恣情作奸者，未死而人身先断矣，虽佞佛何益？”余近作《灯注油》诗，推论浩然之气，有句云：“仙家证长生，老彭可窃比。佛传长明灯，其说亦近似。”与此意不侔而合。

余生平不看小说，十一岁时，疹后避风，不出房门，取《三国演义》读之，看其说神话处，却比正史有趣，旋即弃置，不复记忆矣。京中茶馆唱大鼓书，多讲演义，走卒、贩夫无人不知三国。北人好听戏，尤好武戏，武戏多演三国也。然凡属军人，无论南北，则谈吐间皆演义也，甚矣演义魔力之大也。但三国人才多矣，而独注重于关壮缪，或称关公，或称关老爷，南人则又称曰关帝。北人不敢唱关公之戏，谓一唱即撻奇疾。南人则不忌，然唱者亦必十分严重，一不慎亦即立遭灾害。出台时，观者为之一肃。北人崇拜者，视南人为甚，而关外为尤甚。忆出关时，自沈阳行至吉林，八百里间，山岭多以老爷为名。一日过一老爷岭，树木千章，参天蔽日。岭约里许，车行其中，四面阴森，赫赫然若有英灵之质旁临上也，心目为之震悚。归语涛园曰：“我过老爷岭不止一处，惟此处为最奇，俨若四壁皆关帝也。”涛园素豪放，亦作色曰：“此语摹写入神，关帝信有灵也。”北人言其显应处，无奇不有，前门边有

一小庙，香火之盛，无以复加。传言崇祯时，宫中塑二像，令日者卜之，曰：“一命长，一命短。”帝怒，偏令命短者供之宫中，命长者屏诸前门外。果也，不逾年，明亡宫毁，即像亦与焉。前门外之像，至今香火不绝，官员出差，必往拈香。又有一次，诸名士设一乩坛，忽乩书汉寿亭侯临坛。有一狂生，乃书“吕蒙”二字于掌，曰：“乩如有灵，当知我掌中何字？”乩书二语曰：“汉家天下今如此，关羽何须畏吕蒙？”众益惊服。其余似此者，不可殫述。祀典则以前清为盛。有清入关，战时，每显灵助战，以后遇有战役显应，则必加封号，祀典渐隆。他处庙像皆坐像，京城官祭之庙则用立像，因其庙皇上或亲诣祭也。或疑曰：“壮缪显灵助战，如果有其事，然不助明而助清，则又何说？”应之曰：“壮缪助清，亦助明也；明不能制闯贼，借助于清，以拯民水火，谓之助明，亦何不可？”此说亦言之成理。总之，正直之谓神。壮缪一生，殆不失“正直”二字，当其始从昭烈，旋为魏武所罗致，嗣觉魏武不轨于正，以昭烈为彼善于此，复从而为之戮力。伐吴之役，亦以其时大局尚纷，民生涂炭，不得不冀得一当，以致太平。秭归蹉跎，则关于天数，死有余恨也。而其浩然之气，下为河岳，上为日星，亘千古而不灭，其显灵助战也，亦以千万人壮气所锤，遂偶触之以为用，而其如在其上，在如其左右，则亦以人心为之耳。争地以战，杀人盈野，上干天怒，为人心之所不容，亦即正气所不容也。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者，亦谓正气千变万化，无方体，无定向，固难刻舟求剑，亦非惆怅无凭也。壮缪之事，当以此理断之，不然，则数百年之馨香，亿万人之意向，岂能毫无依据耶！

同治癸酉科，福建举行乡试，时王文勤抚军（凯泰）充监临，查场弊甚严，适对读所同考官，查出誊录生私改墨卷，根究得数人，余友陈藻丞大令与焉。抚军大怒，令置重典，已传竖坡矣（凡督抚杀人，必坐大堂，排衙鸣鼓，将弁鹄立如坡，提囚上，绑押往法场行刑，故闽人呼杀人为传竖坡，亦土语也）。天忽大雷电以风，全城昼晦，抚署棋杆折焉。抚军警于天变，遂宽此狱，而陈藻丞数人免矣。藻丞是科因丁忧不能应试，冒充誊录生入场，为人改墨卷。定例，墨卷添注涂改，有例定字数，若犯例，不能送誊录。今所改竟过三百字，明明誊录舞弊，故为对读所举发。藻丞此役，固为贫所迫，未始非技痒之故，遂忘其所以也。后自应试，联捷成进士，而终于一邑，人谓其后运未终，故天示变以拯之也。余殊以为不然。王抚军执法以惩场弊，是也；警天变而缓狱，亦是也。科场条例太苛，寒士贫乏可悯，法重情轻，故特示变以拯之，天亦未尝不是也。谓因一县令前程，预示保全，天之降鉴，无乃太劳乎？然吾独不能无疑者，世之暴戾恣睢，杀人如麻者，所杀何一非冤？抑且两军相战，近日炮火之烈，一发动辄数百命，而视天固梦梦也。独于此次不梦梦者何哉

？岂天亦忽明忽昧耶？有曲为之解者，科场严例，除杀一柏后，大概立法皆严，行法要必以恕，所以各省学政，考试拿获枪手，只以枷号示惩，向不褫笞臀，且不穷究真名姓，革其功名，所以恤寒士也。此次王抚军发怒，一转念未尝不悔，故藉一雷雨以解之欤。或又谓王抚军贤者，天以其可与言而与之言耳。若彼暴戾恣睢者，示变而彼不悟，天亦无可如何也。此二说虽亦言之成理，而罅漏尚多，但当日之事，身所目睹，间不容发，郑重如金滕故事，俨然明威在上也。

民俗之奢俭，由于地土之腴瘠，而亦有不尽然者。今就吾足迹所至者言之。山海关外，三省土脉久未发泄，农林之利极富，牧畜之产亦足。然过沈阳，则百数十里无人烟者甚多，中途偶有一二草屋，下而憩息，湫隘不堪，而屋中必有两大缸酸白菜。北地独多白菜，冬间腌之，一年即此侑杂粮以为食。每隔二三百里，必有一市镇，商贩亦粗笨之干货而已。近时火车通行，情形自异，然土太旷，人终不能不稀也。辎车所至，不能停留，然大致总在目，此北之偏于东者也。入关而西，风土只是萧瑟，绝非膏腴。种蔬麦以供食，而种稻粱者绝少。西度易水，与榆关内地同。及至京都，则空空九城门而已。然万流仰镜，百货填溢，可谓无美不备矣。居民无土著，所居只旗员旗民，与各省官商而已。日食之需，除朝贵及纨绔子弟暨南省京官盘餐兼味，食用稍丰外，其余上自闲散王公，及疏远之皇亲国戚、八旗官兵，以及北五省京官，一日之中，上者食面食，下者食杂粮。侑食之馔，羊肉鸡卵，一二品已为异味，下者生嚼葱蒜，若调酱则已丰矣。犹忆昔年于役东陵，到店只有面食，乃选豕肉鸡卵为馔。旋亲王至，隔店而住，以亲王之贵，旅行并不带厨传，乃呼豆腐干以侑酒。后查之，亲贵不当权，所食不过如此，特五王爷尤穷耳。甚矣北人口福之薄，远不及南人也。及到江西，赣称鱼米之乡，鱼并不佳，而米独足，夏布瓷器之产亦独优。然居家则一月之中只两日食肉，病则以肉为药。有一富家，熊慕蘧之封翁，余问其家食如何，则曰：“我年将七十，每日可食肉四两。”寻常人家，皆以辣椒、豆豉佐饭，鱼亦不能常具也。街上小户，每人捧一大碗饭，上加两箸蔬菜而已。一日出行，县大路上排芥菜大梗数具，问何物也，曰：“芥菜梗也。”问芥菜梗何以如此之大，曰：“本地种芥菜，不肯整根卖，先卖旁梗，梗随大随卖。到明春，则菜心大如萝卜，可多卖钱也。”问何以排列于地，曰：“晒于地上，干而腌之，切丝以侑饭也。”余闻之悚然曰：“官厨食火腿芥菜脑，取其心食之，惟嫌不嫩。今民食菜梗，尚须切丝，则吾辈直暴殄天物矣。”其俭如此，其富可知。及到苏州，江南膏腴之地，无与伦比，米谷之种尤美，蚕利与浙共之，为他省冠，粤东后起弗及也。且密迩上海，商业发达，富户有逾千万者，其一二百万者，竟不足齿数。与浙比邻，富



力与浙相竞。织货取之宫中，妇女皆穿绸缎，然冬衣只以灰鼠条缘边，非人人尽有皮袄。富不必竟逊于粤，而俭则殊胜于粤也。吾闽山多田少，物产极微。下游漳厦一带，风气近于粤东，通洋亦早，但侨多而商少，侨偶有富者，多不敢回国，逊粤殊甚。上游虽有竹木之利，多为江西人所占，盖上游七成江西人，三成土著人，土著人最有出息者，只开饭店而已。省城一隅，自无出产，士人毫无发展，徒事占哔而不讲求实业。科举时代，省士科名独盛，然科举而得仕，能穀消纳几何？则满城只装满穷秀才而已。且滨海海味极美，而秀才食性又馋，家食茹荤之外，暇则往酒馆醪饮，故中国说老馋者，闽粤并称。富不如人，而馋与粤人竞，岂不败哉？吾到赣、苏两省，见寒士必有数亩之田，怪而问其由。赣人曰：“我寒士就馆，馆谷所人，书院膏伙所人，今之学堂薪水所入，如有盈余，积铢累寸，今年买半亩，明年买半亩；且妇女搓麻织夏布，可资津贴。”苏人则曰：“妇女养蚕之外，持四条木棍，在门外张架刺绣，亦可以资津贴也。”噫，吾今乃知吾闽寒士不能一人有田之故矣。平日饭菜不能断荤，闲暇必上酒馆，虽有馆谷膏伙薪水之入，非随手辄尽不可，而妇女又不能养蚕织麻刺绣，又何从津贴以买田哉？闽之瘠，而奢甚于长江诸省，则因下游接近粤东，沾染华侨恶习而然，其由来亦非一朝一夕矣。统观全国，究竟俭多奢少，国奢示俭，中国其较易于外国欤。

余自中年以后，每于睡将醒时，能倒影自见眼鼻或半面，然必是夜梦境清平时，始有此象，月不过三次耳。放翁自谓晚年目光夜能烛物，其殆眼藏有力欤，究亦莫名其妙。近数年来，更有一奇事：当将睡或将醒，目光蒙瞳时，每见仙佛神像，衣冠甚伟，参列榻前，或仙女、神卒，二三人不等；谛视久之，遂变成帐幔花纹，或为窗槛花格。此自目眩所致，然目眩何必见仙佛？其殆以夜寐不成时，想游仙界佛界以引睡，积想因而成象欤？然积想不入于梦，而必接之于目，则又何哉？其实人世间，何事非幻境？制之以理，断之以心，见怪不怪可也。

余少时即惯迟眠，然就枕即睡，尤失眠之苦。七十时作《匏庵寿》诗，中有“鰥鱼无睡”一语，当时亦特戏言耳。诗寄去之后，竟夜夜不睡，自疑诳语为神鬼所弄。乃年甚一年，后竟非天明不能酣枕。百计引睡无效，常服补阴之药无效，乃细检陆诗，见其七十所作之诗，皆言不睡，乃八十所作者，则多言美睡。可知人到七十，夜必无睡，若到八十，则夜睡而昼亦睡。然名虽为睡，恐亦只昏睡而已，其能得美睡亦甚难事。是睡与不睡乃年龄关系，只可任其自然，不必引以为病。医书失眠之症，特为少年有病者言之，与老年人固无与也。

余少时闻人言，郭远堂中丞半夜即起钞书，点一枝蜡烛，见跋及旦，日以

为常。沈文肃之封翁丹林先生，每晚九点而寝，三点而起，默坐背诵注疏，到八十三时，习以为常，盖其未明而起，起后即不复睡。余则夜间看书，既明而睡，睡后仍得有六点钟酣寝。今年已届八十，秋后却可未明而睡，起时亦较平常为早，虽未至如放翁所云。夜睡而昼亦睡境界，而衰象已寝寻矣。人言老年人更事多，谁知寻常一睡，亦煞须阅历也。

郑稚莘言：“齿与胃相表里，齿之咀嚼力有若干度，胃之消化量亦有若干度；若齿之力强，而胃之量弱，未有不受病者。今之补牙，是助齿之力，而不能助胃之量，害事孰甚。况补牙种种不便，流弊尤不可胜言乎。”此说煞为近理。余六十岁时，与华再云太史（辉）谈，渠年差长，见其须发雪白，问其牙齿无恙否，乃曰：“十年前，谢味余太史（佩贤）予我擦药一方，保全至今，得以无恙。”味余谓齿病。只有风、火、虫三种，而风尤甚。医家重治火、虫，而略于风。此方用薄荷八钱治风，为独得之秘。后味余亦来，详问其方何药，则生熟石膏四两，青盐二两，骨碎补六钱，薄荷八钱，四味而已。余擦之，至今二十年，前后仅落六齿，近复落一齿，余皆无动摇者，未始非此药之力也。凡落齿时，虽不甚痛苦，终觉累赘，有人屡劝补牙，余终深信稚莘之说为不可破也。

黄陶庵《心医》一卷，言：“人之有病，皆心为之；心以为无病，便无病矣。”此即所谓安心是药方也，吾生平颇信其说。今者西医盛行，中医每与之相左：中医病要忌风，而西医偏要透空气；中医病每忌荤，而西医则必要食鸡露。其实同一病也，各治之，亦各愈；其有不治之症，各治之，亦各不愈，所谓药医不死病，死病不能医也。其有奇离之病，起死回生，中西医亦各有所能。惟解剖之术，西医似有特长，不知当日华陀亦优为之，惟其操术奇妙，取快一时，于人之寿源有碍，故当时禁之，其法不传耳。但中西医无优劣之别，而中西人体气实不同，中药偏于气化，而西药则偏于矿质，且药价亦有贵贱耳。

陆贾《新语》曰：“君子之为治也，混然无事，寂然无声，官府若无人，亭落若无吏，邮无夜行之卒，乡无夜召之兵，犬不夜吠，鸡不夜鸣，耆老甘味于堂，丁壮耕耘于野。如是，虽不言而信诚，不怒而威行，岂待坚甲利兵，深刑刻令，朝夕切切而后治哉！”所言升平景象，直追尧舜穆之风矣。然同光之际，亦略得大意焉。余作《忆昔》诗有云：“盛极同光际，升平二十年。投戈重讲艺，耕砚渐成田。荆棘途无阻，豚鱼税尽蠲。当时人不省，忆昔泪潸然。”语系据事直书，自无所用其粉饰。外任后，时事虽稍艰，而守建昌五年，属县只出一盗案。署南安时，虽遇拳乱影响，不三月即救平。移摄抚虔两三年，仍晏然无事。所谓荆棘途无阻，豚鱼税尽蠲者，思之犹神往也。我之想望太平，不过如此，盖所求于造化者本甚廉，亦即孔子不怨天之意也。

大禹德冠百王，而克俭于家，不过菲饮食，恶衣服，卑宫室而已。此三事寻常日用所易行，吾生平兢兢加勉焉。今且以菲饮食言之，余八龄失怙，幼而食贫，三餐虽不至断荤，而夏用冬瓜汤、冬用芥菜汤，日侑饭以为常。而平时所酷嗜者，隔宿芹菜、蒜一味，吾母每晨取前日残羹煨之，以侑早餐，盖芹菜与蒜，愈煨之而愈得味，吾至老食之尚未厌也。逾冠官京师，京曹清苦，家食不改儒素。旋膺外任，前后廿余年，官厨虽不甚俭，而常食终不断蔬。每到一处，必于官廨后锄地自种，盖蔬非种不适口也。退居海上十余年，无园可锄，市购价昂而味又劣，惟晚菘一种极佳，一年必食到二度，间或购芥于闽以充之。七十非肉不饱，吾盖非蔬不饱也，非不食肉，肠胃与蔬笋之气相宜，若食肥鲜侑饭，转无饭香也。此非有意为之，亦习惯成自然耳。此一事也。若衣服，亦非有意求恶也，弱冠当秀才时，夏衣长衫则用夏布，秋天则用漂白布，冬季衣絮而尚之以蓝布衫。有一日赴考书院，前襟为肩舆所裂，归仍取而纫之，未能即改造也。迨至释褐登朝，非复布衣之旧矣，然仕不去贫，官服艰于求备，夏天只用半折纱罗，终未御全透纱衣也；常服悉系自制。犹忆一履之费只京蚨六千，折铜钱六百耳。暑雨骤寒，早值进内，以三金购羽毛褂以遮寒。于役两陵，载道风霜，每假裘而行。出关时，制斜纹布缺襟袍以御尘沙，此物尚在笥未朽也。及膺外任，狐裘羔裘，仍袭京曹所陆续旧置；黑貂之裘，为薛外舅所赠送，皆逾三十年之物，此尚足以傲晏子也。退居后，嫁一女、一女孙，半举以充奁物。严冬御寒之大裘，尚煞费集腋之劳，颠倒紫凤天吴，而吾则服之无志，绝不作金尽裘敝之叹。此又一事也。吾家有老屋，本不卑也，道光廿九年吾祖所置，于今八十余年矣。子姓渐繁，不能同居，吾即作宦，将来必须另自购屋。癸卯旋里，邻右有屋三椽，价值一千五百千，乃以无费不能成议，卒赁庑以居。意拟积有余费，于乌山之麓，购一有园之小屋，以庇风雨。旋集山费四千以待用，乃以地价日高。嗣又以债务半遭亏损，则他日归山，只有仍赁庑矣。既无宫室，何论高卑？此又一事也。孔子曰：“奢则不孙，俭则固。”与其不孙也，宁固吾之俭。吾故不耻为顽固也，但吾年已八十，当五十岁以前，所交皆旧人，所用皆旧物，守俭尚易。近三十年来，海邦机器益发达，衣食住之舶来货，一一尽美，且日本货比国货为廉，吾不免为习俗所移。然吾自守者，戒吸香烟，以其为鸦片变相也；忌用洋袜，以其穿著费事也。汽车盛行，下泽，车又不适用，吾必不得已出门，则借车乘之，借之不得，便不出也。其余饮食起居，随其所遇，惟适之安，仍以妄用一文钱为戒而已。余到上海时，人以余之俭为装贫，然余不轻言贫，自耐贫耳。初因予疾而迟留，继因连年家书烽火而阻，其实皆以归未有宅，遂致因循至今也。国奢示俭，当此欧风狂醉之秋，岂不徒费唇舌？然海邦经济恐慌，外人迫于大势



，不得不力求节缩。吾国沾染奢俗三十年，不得谓由奢而俭之果不易也。今且将香烟、洋袜之类，凡家常之可有可无者，悉屏而去之，以求免饥饿不能出门户之一日，当亦人所乐从也。若大吃著华美，富贵人应享之福，各有因缘莫羨人，吾亦不必置喙矣。总之，三十年为一世，三十年中，世变极矣，物穷则变，变则通。《周易》一书，秦火未经烧灭，当时殆有天意也。余作此说毕，客有难者曰：“君此作现身说法，竟以神禹自居，不己泰乎？”余曰：“不然。禹一生事业，从自身克勤克俭做起；余不获有其事业，而但求克俭于家。人皆可以为尧舜，尧舜可为，禹岂不可为哉？”